

往事回眸与思考

中国农村改革先行官
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安徽省原省长亲历的革命与改革岁月

王郁昭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往事回眸与思考

王郁昭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往事回眸与思考 / 王郁昭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034 - 3435 - 8

I. ①往… II. ①王… III. ①王郁昭—回忆录 IV. ①K827 =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4566 号

责任编辑: 王文运

装帧设计: 杨飞羊 蒲亨军 许 丽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邮编: 1024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7.75 插页: 4

字 数: 483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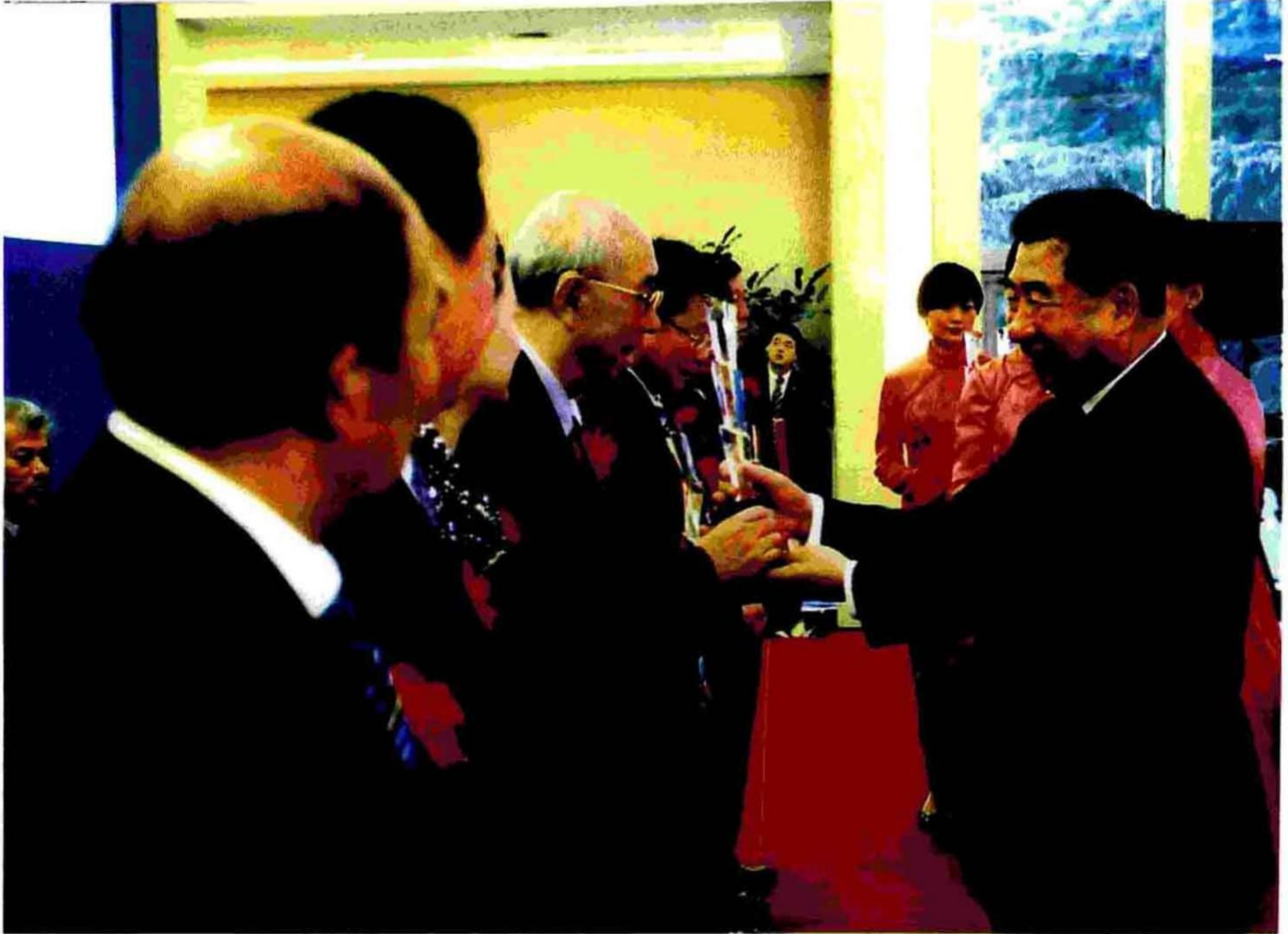
与万里同志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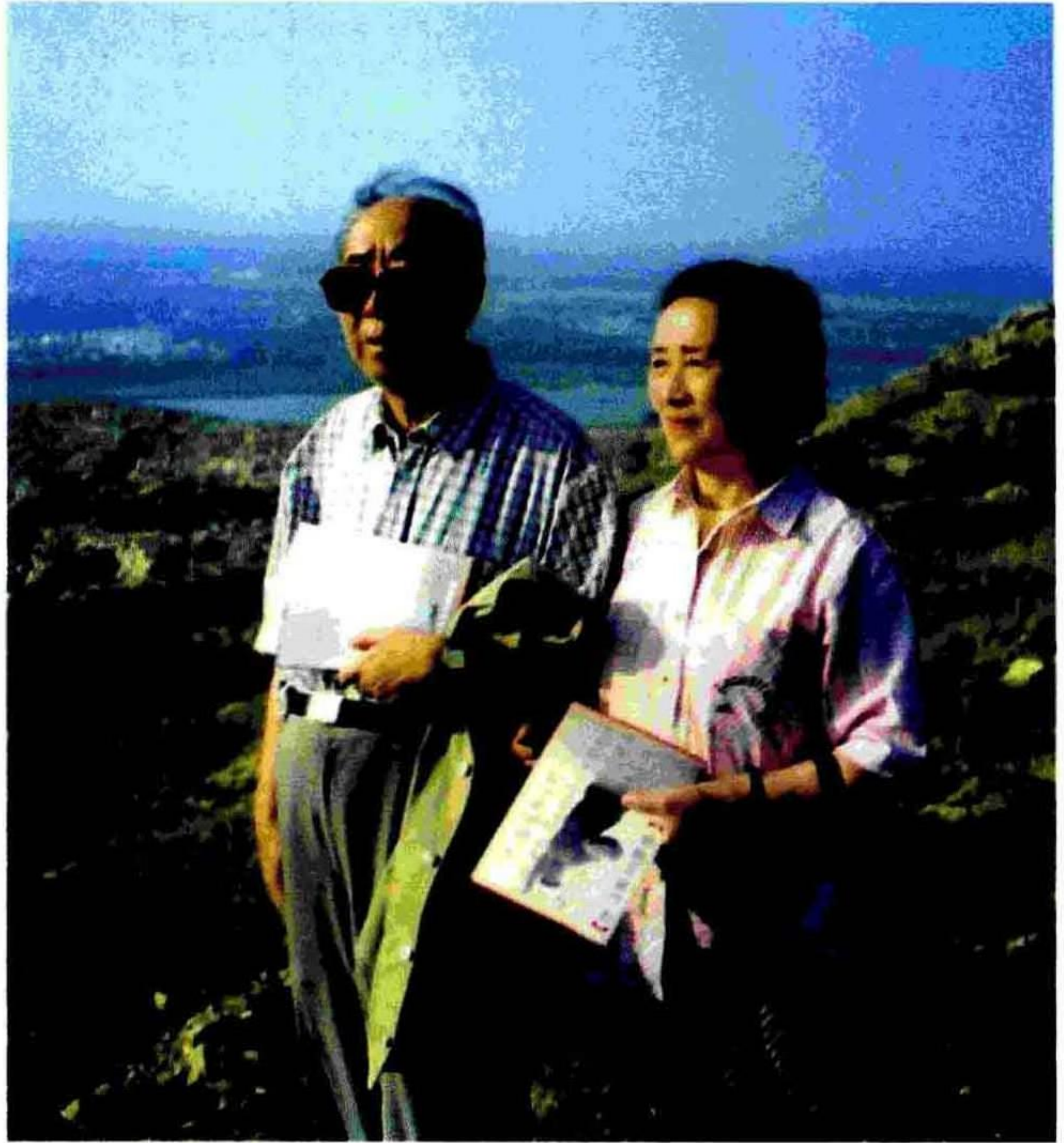
参加万里题写馆名的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揭幕仪式（左一为时任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明方、右一为原安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富林）



在大包干纪念馆与小岗村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宏昌夫妇（左三与左五）合影（左一为时任安徽省滁州市委副书记毕美家）



2010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同志为获得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的王郁昭同志颁奖



与夫人贾粹华



全家合影

序一

◎崔传义

本书是王郁昭同志从参加革命到亲历改革开放的回忆录。对许多人来说，特别是对从事农村工作和政策研究的人来说，王郁昭同志是一位非常熟悉的人物。他曾经担任安徽省省长、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在农村改革最艰难时期，他作为安徽滁县地委书记，不畏政治风险，支持农民创造，被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称作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

2010年12月，王郁昭荣获第三届“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获奖评语说：“安徽小岗为中国农村改革钻木取火，他是那个让星火成燎原之势的人。他力排众议，坚持用农民的积极性和农业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先进性；他胆识过人，在政策得到中央认可之前，已在滁州七县300多万人口所在的70%的村庄实行了新体制——大包干；他奔走呼喊，向省、中央为大包干报户口，为中央的正确决策准备了成功的先驱案例。……王郁昭成功践行了‘大包干’这一新中国农业的第一步改革，促进了农业大增产，启动了农民减贫的体改效应。”这个评语，准确地评价了他推动农业大包干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王郁昭长期在大学工作。“文革”中，他受到迫害，全家下放淮北农村，当了农民，这段经历让他体会了农民的疾苦，与农民

结下深厚感情，也了解了农村的问题。后来，他被重新起用，在全椒县主政五年，改变了这个县派性严重、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落后的局面，使全椒成为全省的先进县。担任地委书记后，他组织滁县地区大批干部深入基层，了解民情，开展对“左”的错误影响农村经济政策的大调查，形成《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万里同志对这份报告的批示，引来全省上下三个月的调查，最终形成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规定”），突破禁区，放宽政策，为群众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了良好氛围。进入农民探索农业责任制的阶段，他发现基层为抗灾暗自实行包产到组、棉花包产到户等“秘密武器”，非常重视，亲自进行调查总结，将这些做法在各县试点并推广，形成包产到组、大包干到组、包产到户等联产责任制由群众纷纷创造出来的局面。在多种责任制的比较、借鉴中，小岗农民首创了大包干到户，但招致强烈的反对。他怀着对农民的深厚感情，排除险恶，坚决支持小岗农民的创造。在全省农业会议上，他为“大包干”报户口，得到万里同志的高度评价和鼎力支持。

万里同志调离安徽后，“双包到户”遭到轮番围攻，王郁昭在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坚定不移地顶风推行“大包干”，全然置“乌纱帽”于不顾。不久，邓小平同志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旗帜鲜明地肯定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县的“大包干”，迎来了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凯歌挺进。

王郁昭有领导农村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又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农村改革每前进一步，他都进行一次理论结合实际的回顾和思考，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用于指导改革。一是提出“用农民积极性和增产来检验生产关系的适应性和先进性”的理念。而农民要有积极性，就要有自主权和多劳多得的物质利益，这就要改革影响其自主权和经济利益的制度。二是用农民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来衡量责任制，提出“大包干到户与包产到户有

质的不同”。他认为，两种到户在分户生产，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关系上有共同点；但包产到户中，农民还没有经营权，种田要按公社、生产队的生产计划统一进行，也没有产品支配权，生产的东西要上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上缴国家任务，扣除集体提留，然后按各户上缴产量，计算出工分，按工分分配给农民，在统一分配中容易出现贪污和不正之风，农民不放心。而大包干到户，农民只需“包干上交”国家征购任务、集体提留，除此之外的收获，全部都是农民自己的。农户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产品分配的支配权，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主体。这就意味着旧体制的基础已被瓦解，新体制的基础已经建立。来自实践的理论创新，赋予他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决把农村改革进行到底的大无畏气概，并用来为“大包干”进行政策论争。胡耀邦同志到安徽考察时，既肯定了他带头实行“大包干”的作为，又称赞这种政策论争对全国有带动意义。

在担任安徽省省长期间，王郁昭继续坚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他非常重视阜阳地区农民创造的新经验，与农民共同探索中部农区乡镇企业发展的路子，提出安徽乡镇企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在于千家万户，要以户办、联户办为重点，发展专业户、专业村，依托小城镇，发展专业市场和一村一品、一乡一品或数品的区域经济。

王郁昭就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后，面对农民流入城市的“民工潮”的出现，率先给予支持。他认为，把“民工潮”说成“盲流”是不符合实际的，下达指标清理进城农民是不可取的，要允许劳动力流动，形成劳务市场。政府要提供服务，使农民在转移中少受苦、少受损失。他发起成立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带领一批青年学者研究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为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建言献策。他倡议开展全国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验，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将就业工作的视野扩展到农民。他主张从我国走出二元经济结构和体制的视野解决农民工问题，呼吁解决农民工市民化是“十二五”期间的关键问题之一，要以公共服务均等

化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实现农民的第三次解放。可以说，他与农民群众和时代发展同行，在支持农民实行“大包干”、发展乡镇企业、进城就业这三个伟大创造中都做出了贡献。

本书翔实生动地记述了作者的成长、工作与经历的社会变迁，特别是实行农业“大包干”的安徽农村改革及此后一些重大改革的主要情况和发展历程。阅读此书，当有“鉴往知来”的益处。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由报社调到滁县地委办公室。从那时起，长期在王郁昭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近两年，郁昭同志花了很大的精力撰写这部回忆录。这部书稿，是这位85岁的老人，用铅笔一字一句完成的。我负责安排打印和帮助校对书稿。在这个过程中，数十年间在他领导下工作学习的情景不断涌现眼前，感怀领悟难以言表。在这部书出版之际，谨作此文，以表拳拳之心。

(序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王郁昭同志秘书)

序二

◎王宗法

20世纪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既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使几千万人死于非命、无以数计的财产毁于一旦，给人类文明的进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与此同时，由俄国十月革命带动的中国革命乃至一系列亚非拉国家摆脱殖民主义体系的民族、民主运动，从根本上刷新了世界的格局。而科技跃进更以空前的速度与规模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迅速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与生活质量，把社会文明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因此可以说，20世纪是一个变化巨大、五彩缤纷的历史时期，这在中国就表现得非常突出、非常典型，其革命性的特点就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很幸运，王郁昭就出生在这个革命时代来临之初，并与这个时代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当然，这样的个体生命与大时代巧合的例子绝非个别，而是整整几代人的共同命运。本来，一个生命来到人世纯属偶然，因而一个生命与怎样的时代相遇也属偶然。但是，个人与时代相遇虽属偶然且不能左右时代的走向，却可以也应该好好地把握自己，在某种程度上积极影响时代的进程，由是，就造成了个体生命之间千差万别的生命状态与结局，而本书的作者王郁昭则是一个出色地把握自己的人物。他迄今走过的80多年风雨历程，经历了从自发到自觉地与时代紧密结合的革命之旅，并在历史大转折关头焕发出特殊的生命光彩，成为“手把红旗旗不湿，弄

潮儿向涛头立”的时代骄子，为人民立下了非常人所能及的历史功勋——是为中国历史新时期重大标志之一的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这样，王郁昭这个名字就与一个新时代紧紧地融为一体了，成为一个抹不掉的文明记忆和历史存在。很显然，王郁昭是幸运的，这是历史给予他的特殊机遇，也是时代授予他的一份难得的殊荣。

那么，历史的机遇同样摆在千千万万个和王郁昭具有相同经历与处境者的面前，何以独独被王郁昭抓住了呢？这正应了一句名言：机遇总是特别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临渴掘井难能如愿，未雨绸缪方可成功。王郁昭就是那种为时代的需要做好了准备的人。这种准备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准备。王郁昭出生在一个开明的家庭，少年时代即投身革命，当他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社会大变动的历史关头已过知天命之年，又处在地委领导岗位，近40年的革命阅历和丰富经验，使他具备了脚踏实地、眼睛向下的优良作风和可贵素质，一切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 and 情愫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从而赋予他敢于面对现实、善于倾听底层声音、敏于支持群众首创精神的革命自觉性。二是理论准备。新中国成立之初，王郁昭正值青春年华即作为军代表接管了芜湖市文教事业，包括一所大学和十几所中学、职业学校、几十所小学及若干文化团体，做了大量除旧布新工作，多有建树。随即又被调到安徽大学长期任职，既搞行政管理，又做教学研究，尤其还到马列学院即中央党校专门进修了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特别在哲学研究中用力颇深，出版了专著，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理论素养。一般而言，像王郁昭一辈的革命者，分别在实践方面或在理论方面有所准备的人并非绝无仅有，但在这两个方面都有如王郁昭这样准备者则就屈指可数了。值得注意的是，王郁昭在从事近20年高校理论工作和近20年基层实际工作之后，又转到地委领导岗位担负起一个地区主政者的责任，这就给了他发挥近40年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素养相结合的优势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空间。很显然，这对王郁昭来说又是一个

可遇而不可求的特殊机遇——是历史的需要选择了王郁昭，也是王郁昭适应了历史的需要，这两者的机缘巧合实在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因为这是个人与时代缔结良缘的一个生动实例。当然，王郁昭得以从高校走上从政之路，尤其是由一个下放农村当普通农民的身份被重新起用，这与时代的变化、人脉的缘分（杨效椿的关注）分不开；而后来的作为和升迁，更与万里的支持特别是邓小平的谈话关系至大，如果没有这一切，王郁昭既不可能再被起用，也不可能有大作为，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即令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倘若主观上没有前述两种准备（实践与理论），那也未必能有王郁昭式的作为。换言之，当时代给一个人提供了可以有所作为的舞台时，这个人是否准备了足以登台演出的拿手好戏或看家本领，则是关键所在。这就是王郁昭区别于他的许多同辈人的一点特别之处。必须看到，这一点特别之处，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源于他历经长期实践准备和理论准备之结合而形成的可贵素质与人格力量。概括起来看，王郁昭的这种个性特点主要体现为他在人生旅程中的两种表现。

一是顺境不懈怠。应当说，王郁昭从参加革命之日起到“文革”前的20多年间，个人处境一直比较顺。事实上，这种情况在王郁昭一辈革命者来说，也并非个别现象，可以说是一种常态。但常态之下也容易使人变得平庸，以至在不经意间放松起来，不思进取。曾经被毛泽东同志称赞过的王蒙的成名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所刻画的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刘世吾，就是这类人物的一个形象代表。至于比刘世吾走得更远的不仅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亦不乏其例，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新中国成立初两个著名的例子。当然，有幸从枪林弹雨中走到和平环境里兢兢业业、不断进取者还是大多数，王郁昭即属此列。这从他在芜湖和合肥两地诸多方面工作业绩的建树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书中也作了非常具体的记叙。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王郁昭投入工作的热情和勇于开拓的精

神一直伴随着他的前进步伐和生命历程，可以用永不疲倦、一往无前来形容。让人敬佩的是，这种精神在他中年走上仕途以后依然一以贯之，从滁县地区（现改称滁州市）到中央机关，从政府智囊岗位到民间慈善机构，凡是他在所在的单位、凡是参与的工作，他都全力以赴、竭智尽力，总是事必躬亲、精益求精，力争做到最好。更令人感动的是，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被调换过多种岗位、从事过许多性质不同的工作，但都很快地适应起来、运转起来、推动起来，从而做出实绩包括举世瞩目的重大业绩，这其中就包含着他一直坚持在干中学、在学中干，自觉地把工作与学习结合起来、永不懈怠的高度进取意识与奋发向上精神。应当说，这是成就王郁昭这个人物鲜明个性的特征之一。

二是逆境不沉沦。谚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这种情况古今中外皆然，动荡年月尤甚。王郁昭生在革命年代，又经历了运动迭起的多事之秋特别是“文革”浩劫，得以死里逃生已属万幸，焉能指望置身事外？书中对此也作了相当详细的记述。耐人寻味的是，王郁昭的逆境不但比一般人来得早，而且比一般人来得特别，一言以蔽之，比多数同辈人的逆境更“逆”。其一，当“文革”才刚刚拉开大幕，他就被所在单位作为最大“走资派”抛了出来——实际上他并不是一把手，自然也当不了这个单位的“头号”角色，自是白白代人“受过”了（书中不忘记录了这页历史，即后来他与抛出他的“一把手”同在“劳改大队”时的有关对话，不失为趣笔之一）。问题是，他并未消极地任人宰割，像某些人那样一味地检讨复检讨、认罪连认罪，不辨是非、不分黑白地仰人鼻息、苟活于世。不，他不但直面自己无怨无悔的革命历史，而且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信奉的真理，从而在批判他的所谓修正主义理论的大会上旗帜鲜明地宣扬了他所信仰的科学的哲学思想，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一派无知妄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批得那些假革命的学术骗子气急败坏、无辞以对，有力地伸张了正义，在那种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日子里，无异于空谷足音，自有

振聋发聩的意义。显而易见，这里表现出的不光是难能可贵的一腔正气与一身骨气，还有那敏锐地识破惑众妖言的一双火眼金睛和一个智慧不凡的大脑，说得透彻一点，那就是手中握有真理的力量。其二，在“文革”局面失控、成千上万青年学生就业无门时，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与此同时又启动了一般干部和城市居民下放农村的热潮，不料王郁昭一家也在劫难逃，被一起下放到出名的贫困县利辛的一个生产队，当起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本来，王郁昭当时是十三级干部，属高干，不在下放之列，不知道什么原因竟也被一股脑儿下放了，这在高干中自属例外，说这是“逆境”自然也就“逆”得出奇了。然而，身处此境的王郁昭与妻子贾粹华并未就此消沉下去，而是气定神闲地与农民相处得十分融洽，王郁昭以自己的乐观、坦荡、平易近人的朴实与和善，赢得了左邻右舍直呼其“大老王”的亲切称谓，而贾粹华则被群众推举为至关重要的“掌秤”人选，可见他们不但与农民在生活上打成了一片，而且在情感上真正赢得了信任，成为农民的贴心人。这样的一段农村生活经历，对于王郁昭而言，其意义自然要比干部下乡搞“三同”更彻底更深刻，对于了解农村、农业和农民，那真是不但“身”入了，而且“心”入了，属于原生态式地融入民间、深入生活，这对于他后来到全椒、滁县相继开创三年跨出三大步的新局面，自然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段下放当农民的日子，同他新中国成立初进入中央党校作理论上的深造，具有殊途同归的特别意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重新了解现实、熟悉农村，认识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正是具备了这样坚实的人生历练与思想基础，王郁昭才有可能义无反顾地迎风逆浪、破釜沉舟地支持凤阳小岗村农民的创举，在面对农村一场影响全国前途的伟大变革的关头，坚定地站在时代的前列，充当了一个为农业“大包干”报户口的人，并在后来农村政策的研究与制定中做出了独特贡献。无疑，这一步的迈出，既与顺境不懈怠的创造性经验积累分不开，也与逆境不沉沦的特殊生命体验息息相

关，正是这正、反两方面的历练使王郁昭变得更加成熟了，而“报户口”之举，不过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和理论家合乎逻辑的行动归宿，它在本质上是与万里的坚定支持、邓小平的睿智谈话一脉相通、彼此呼应的，既体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应遵循的正确方向，也反映了中国人民普遍存在的现实追求与根本利益所在，实际上也就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执政理念（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和科学发展观的客观基础与生动见证。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的一生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往事回眸与思考》一书，是王郁昭在其风雨八十年中亲身经历的一些真实的故事，通过这些故事可以使后来的人从中鉴往知来，获取继续开拓进取的智慧与力量，因而这是一本意义不凡的好书，既具有文献价值，又富有现实启示，值得认真一读与收藏。

（序者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安徽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